

略述巨贊法師 「新佛教」思想的理論與實踐

張家成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中文摘要

巨贊法師是現代中國高僧，他畢生追隨太虛大師，矢志佛教革新。其「新佛教」思想在繼承太虛大師「人間佛教」思想的基礎上有所創新，並且對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的佛教建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本文在簡略描述其改革佛教的一生經歷之後，對其「新佛教」理論的內涵及其在1949年以後中國的實踐作了簡要而又深入的分析 and 論述，認為巨贊法師「新佛教」思想的理論與實踐，其實質就是探索佛教如何才能與社會及時代相適應，即「佛教如何與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一重大歷史課題。

關鍵字：巨贊法師 人間佛教 新佛教



An Analysi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ster Juzan's "New Buddhism" Thoughts

Zhang Jia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Master Juzan is a famous modern Chinese monk who has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following Master Taixu in committing to the innovation of Buddhism. His innovative "new Buddhism" inherits the thoughts of Master Taixu's Humanistic Buddhism, and has exerted tremendous influence o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Buddhism since 1949. After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Master Juzan's experiences for the reform of Chinese Buddhism,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w Buddhism" in China since 1949. Recognizing that Juzan'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w Buddhism", this paper explores important historical topics such as "how can Buddhism fit in with modern society" and "how can Buddhism fit in with the Chinese socialist society."

Keywords: Humanistic Buddhism, new Buddhism, academia and production

一、前言

如同處在轉型期的劇烈動蕩的中國近現代社會一樣，一部中國近現代佛教史，也是佛教改革、復興和現代化的歷史，同時亦是「人間佛教」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演變的歷史。筆者曾將中國近現代佛教革新或佛教現代化的歷程分為這樣四個階段：首先是「應用佛學」（或稱經世佛學）階段，以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梁啟超等晚清士林人士為代表；其次是「居士佛學」階段，以楊文會及歐陽竟無等支那內學院一系為代表；第三是「人生佛教」階段，以太虛法師等為代表；第四是「人間佛教」階段，以「後太虛時代」的印順法師、巨贊法師以及佛光山星雲大師、法鼓山聖嚴法師、慈濟證嚴法師等為代表。縱觀上述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各階段及其思潮，¹毫無疑問，「人間佛教」理論是整個二十世紀佛教改革思潮中的最重要的理論成果。

巨贊法師是中國現代史上著名高僧，中國佛教協會的創始人之一。然而，由於諸多因素的影響，巨贊法師的佛教思想及其在中國現代佛教改革思想史的地位和價值一直未能得到目前佛教界和學術界應有的重視和研究，甚至還存在一些誤解。如于凌波居士曾這樣說過：「在1988年台灣與大陸兩岸開放交往之前，巨贊在兩岸間是一位頗具爭議性的人物。台灣方面說他是『佛門敗類，變節投降』；大陸方面說他是『進步僧人，有維護佛教之功』。」²筆者認為，巨贊法師不僅是一位思想進步、愛國愛教的現代高僧，同時還是一位佛教改革家。在中國現代佛教改革史上，巨贊法師是繼太虛大師之後中國（大陸）佛教改革運動的領袖，其佛教改革思想與太虛大師的佛

1. 參見張家成：〈人間佛教與中國佛教的現代化〉，載《佛教與當代文化建設研討會論文集》之第三篇，西北大學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2. 于凌波：〈兩岸的爭議人物——釋巨贊〉，載《中國近代佛門人物志（第4集）》，台北：慧炬出版社，1998年初版，頁163。



教改革是一脈相承的。作為其佛教改革思想的理論成果，其「人間佛教」思想暨「新佛教」理論在適應新的社會形勢下，不僅在理論上有所創新，而且還有一定程度的落實和實踐。正如著名佛教學者黃心川先生在《巨贊法師文集》「序言」中所說：「巨贊法師是改革浪潮的浪尖兒，太虛路線的繼承者，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為了佛教的復興和改革殫思竭慮、勇猛直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奉獻了一生。」³

本文以巨贊法師人間佛教暨其新佛教理論及其在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的實踐為例，闡述其對於太虛大師佛教改革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從而說明巨贊法師對現代中國佛教改革的重要貢獻及其在中國現代佛教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追隨太虛大師，矢志佛教革新

巨贊俗家姓潘，名楚桐，字琴朴，江蘇省江陰縣人，生於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他幼讀私塾，及長就讀於江陰師範學校，民國十六年（1927年）畢業後到上海，同年考入大夏大學學習。由於他在校時就參加了「進步活動」，大學未畢業就返回江陰，擔任小學校長。後來因為帶領中小學老師罷課，遭到通緝，於是在1930年秋，逃到杭州，避居在西湖的佛寺裡。隔年三月，太虛法師來到杭州靈隱寺，經太虛大師介紹，巨贊依靈隱寺方丈卻非法師剃度出家，取法名傳戒，字定慧，後來改名巨贊。

實際上，據巨贊法師後來回憶，⁴早在他從江陰師範學校畢業後的那年暑假期間，巨贊就從家裡偷跑到常州清涼寺找應慈法師，希望在此出家。但機

3. 黃心川：〈序言〉，《巨贊法師文集》，載於朱哲編：《巨贊法師文集》，團結出版社2001年，頁2。

4. 參見巨贊：〈一年來工作的自白〉一文中的有關回憶內容。

緣不巧，未能如願。於是又轉到杭州靈隱寺，剛巧遇到太虛法師在靈隱寺。太虛法師見狀，便要他寫一篇「出家志願書」。於是巨贊用駢文寫了四個志願，共一千多字，其中有一個志願就是「改革佛教」。當時巨贊並未研究過佛教，他所知道的佛教知識，也只是在靈隱寺等寺院看過幾本如《安士全書》之類的佛教通俗知識而已。他所謂「改革佛教」，也不知道究竟從何處說起。這篇「志願書」原稿也在「一二八」之役中被毀。可是太虛法師看了後卻很賞識，在原稿中寫下了「斯亦有志於道之士，得其師導，可臻上達」的評語。幾天後，巨贊就跟隨太虛法師來到廈門閩南佛學院，學習了幾個月的佛學。時值閩南佛學院大鬧學潮，而巨贊的父親又苦苦催歸，出家一事未果。於是，來到上海的大廈大學又讀了幾年的書。

巨贊在靈隱寺出家以後，先後曾到杭州、南京、重慶、廈門等地，悉心研讀佛學。他從法相唯識學的研究開始，細細讀過該宗「一本十支」及所有注疏，還經人介紹到南京支那內學院，並曾得到歐陽竟無居士的指點，又應約到四川漢藏教理院教書。他在五、六年的時間內，前後攻讀了七千多卷藏經，從三論般若、天台、賢首、禪、淨，以及大小乘經論，均有涉獵。而且，他每看一本書，都要做筆記；對每一個問題的思考和解答都有記錄，積稿盈筐，字數竟達數百萬字之多。他曾在《佛教公論》雜誌上發表〈先自度論〉、〈為僧教育進一言〉等文章，弘一法師評價說：「嘆為稀有，不勝忭躍，求諸當代，未有匹者。」巨贊還在《論學》雜誌發表了〈評熊十力所著書〉一文，對《新唯識論》提出批評，並將此文寄給寓居北京的熊十力。熊先生在復信中稱該文「是用心人語，非浮士口氣。」

1937年，巨贊法師離開支那內學院，應聘到太虛大師創建的廈門閩南佛學院任教。不久抗戰爆發，巨贊法師不得不滿懷悲憤離開廈門，經香港，去廣東、湖南，一路宣傳抗日救國。他在湖南南嶽認識了同在南嶽的田漢、馮



乃超、杜宣等進步人士。經田漢等人介紹，巨贊見到中共領導人葉劍英。葉劍英對愛國僧人參加抗日表示歡迎，於是巨贊便在湖南佛教界籌組抗戰協會，後又根據葉劍英的建議，將這一組織改為「南嶽佛道教救難協會」。在協會的成立大會上，巨贊發表了著名的〈南嶽佛道教救難協會告各地救亡團體同志書〉，號召廣大佛道教徒「充分運用正確的佛道理論，來推動國際佛道信徒的反侵略運動，和喚起敵國人民的反醒和同情」。南嶽佛道教救難協會的成立，在全國佛道信徒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39年春，巨贊法師在南嶽祝融峰上封寺，見到了特地來南嶽給正在舉辦的遊擊幹部訓練班作報告的周恩來。周恩來看了巨贊法師起草的那篇〈告各地救亡團體同志書〉後，連聲稱好，並當場揮毫寫下「上馬殺賊、下馬學佛」八個大字題贈巨贊法師，極大地鼓舞了巨贊法師和南嶽數百名僧道。

自此以後，巨贊法師便輾轉奔走於福建、香港、廣東、湖南等地，積極宣傳和組織佛教徒參加抗日救國活動。1940年秋，巨贊應廣西佛教會理事長道安法師之邀，到達廣西桂林擔任廣西佛教會秘書長，並以南嶽佛道教救難協會名義與道安法師共同創辦並主編佛教界進步刊物《獅子吼》月刊，繼續宣傳抗戰救亡的愛國理論和佛教革新運動。

《獅子吼》創刊以來，除刊有歐陽竟無、太虛大師、慕伽法師等名家的文章之外，巨贊法師本人也在該刊物上以巨贊、萬均、編者等筆名，先後發表了〈新佛教運動與抗戰建國〉、〈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佛家之救亡抗戰論〉、〈致抗日將士慰勞書〉、〈悼念新佛教運動的戰士理妙法師〉和〈從禁止南嶽進香說起〉等名作，大力宣揚抗戰救亡的愛國理論與佛教革新運動，有力地推動了佛教界抗戰救亡的積極性。太虛法師曾題詩讚揚《獅子吼》月刊，說：「五夜陣風獅子吼，四鄰鞭爆海潮音。大聲沸涌新年瑞，交織人天祝瑞心。」把《獅子吼》月刊與《海潮音》相提並論，足以說

明太虛法師對《獅子吼》月刊的好評和重視了。

1942年，巨贊法師離開桂林，到卓錫桂平西山，任龍華寺主持。1944年，抗戰到了最嚴峻的時刻，長沙、衡陽、桂林、柳州相繼陷落，巨贊法師不得不離開桂林，避居北流，任教於遷至此地的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同時繼續著述，並從事宣傳抗日救亡工作。《新佛教概論》一書，即撰著於此時。

抗戰勝利後，巨贊法師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經廣州回到杭州靈隱寺，擔任浙江省及杭州市佛教會秘書，並協助若瓢、會覺法師等創辦了武林佛學院，後來還曾主持院務工作。⁵1948年底，武林佛學院因經費來源斷絕等原因被迫停學。此後，巨贊法師往來於台灣、香港、澳門之間，致力於講學，並考察佛教情況，加強佛教界的聯絡，呼籲改革佛教教務。為了迎接新中國誕生，巨贊法師還應潘漢年的要求，草擬了新中國佛教改革方案，呈送給黨中央有關領導。

1949年4月巨贊法師從香港出發，來到北京。9月，巨贊法師作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此後，他連續當選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及第六屆的常務委員。10月1日，巨贊法師和趙樸初等一起，作為佛教界代表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1953年，巨贊法師與趙樸初、呂澂、周叔迦等發起組織中國佛教協會，

5. 巨贊法師主持武林佛學院的經歷，應該說是人所共知的。除巨贊法師之外，參與武林佛學院的均為太虛大師弟子，如會覺、演培、妙欽以及印順法師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相關人士的回憶錄中，卻有意無意回避了巨贊法師在創建武林佛學院這段歷史中的重要貢獻。參見印順法師：《妙雲集》下編之十《華雨香雲》（有中華書局單行本）之七〈我回到了江南〉；演培法師：<http://www.dizang.org/fjrw/fs/ypfs.htm>等人的有關回憶。



巨贊法師任籌備處副主任。中佛協正式成立後，巨贊任副秘書長。1956年中國佛學院成立，巨贊出任副院長，並親自授課；不久又出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並主編《現代佛學》與《法音》雜誌，負責《大百科全書·宗教卷》中有關佛教部分的編審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巨贊法師也受到衝擊，被捕入獄達十年之久，直至1975年以後才得以平反昭雪。巨贊出獄後，在1981年繼續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副秘書長，後來又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致力於落實宗教政策以及佛教的宣傳和學術工作。1984年，巨贊病逝於北京，年77歲，僧臘52年。

巨贊法師不僅博通三藏，還研讀先秦諸子、宋明理學，以至於馬克思、恩格斯、康德、黑格爾等科學、哲學著作，莫不涉獵。他還通達英、日、德、俄諸國文字，晚年猶孜孜不倦學習法文。巨贊晚年寫有〈詠懷四律〉，這些詩句中甚至有「誇克」、「核酸」等科學上的新名詞，可見其思想緊跟時代步伐，亦可由此略窺其內心的思想及感悟。

巨贊法師一生著述頗豐，主要的佛學論文有〈評熊十力所著書〉、〈佛教的回顧與前瞻〉、〈龍樹提婆與無著世親〉、〈道安法師傳〉、〈鳩摩羅什法師〉、〈法顯玄奘兩大師〉、〈天台與嘉祥〉、〈禪宗的思想與風範〉、〈華嚴宗的傳承及其他〉、〈般若思想在中國漢族地區的發展〉、〈關於玄奘法師的會宗論〉等。時人將其文字結集出版，先後有黃夏年主編的《巨贊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志雲主編的《巨贊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朱哲主編的《巨贊法師文集》、《巨贊法師文集續編》（團結出版社2001、2002）以及《巨贊法師全集》（分別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版的朱哲主編的8卷本，以及圓持主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版6卷本）等多種問世，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留下來的文字之多，以及其淵博的學識。

三、巨贊法師「新佛教」理論的主要內涵

巨贊法師是一個愛國、進步、富有鮮明時代氣息的現代高僧，其思想緊跟時代潮流，可謂「與時俱進」。

早在二十世紀初，國內佛教界和學術界就開始了對佛教改革的探索和實踐，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改革思潮的最突出的體現就是所謂「新佛教運動」的廣泛推行。被譽為近代「佛教復興之父」的楊文會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大力興辦佛教教育等振興佛教的努力，「奠定了新佛教運動的基業」。⁶二十世紀以來倡導具有「革新」意義的佛教學說就有多家，如楊度（1875-1931）的「新佛教」、⁷楊仁山、歐陽漸等倡導的「居士佛教」，溫光燾居士之「新佛法」；⁸同時，中國現代佛教革新思潮還遍及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如在日本就有《新佛教》雜誌創刊。當然新佛教運動的中堅當推太虛法師及其倡導的以「人生佛教」為內涵的「人間佛教」思想，這一思潮貫穿了二十世紀始終，也代表了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改革的基本精神和發展方向。換言之，「人間佛教」理論成為中國近現代佛教革新思潮中最重要理論成果。因此，本文以為，中國近現代化史上的佛教改革、新佛教、佛教現代化或「人間佛教」思潮，用語雖有不同，內涵卻是基本一脈相承的。

受太虛大師的影響，巨贊法師一直秉持「人間佛教」的理念，主張「佛教革新」。與太虛法師倡導的「新佛教運動」密切相呼應，巨贊法師在30年代撰寫並於1941年出版了達18萬字的《新佛教概論》。該著中最重要的內容

6. 巨贊：〈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巨贊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版，頁647。下引該書，僅註明篇名、書名及頁碼，其餘從略。

7. 楊度：〈新佛教論答梅光義君〉（1928年），載《曠代逸才——楊度卷》，東方出版社1998年6月，頁298-325。

8. 溫光燾：〈新佛法與新政治〉，載《覺有情》第9卷第10期，1948年10月。



是他的「新佛教」理論，亦即其人間佛教思想。在該書中，他提出今後中國的佛教應遵循「生產化」和「學術化」的宗旨，組織寺僧參加日常生產，繼承「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並重的古德風規，來革除佛教界存在的希求安逸、耽於懶散、脫離民眾的弊病；發揚中國佛教重學術研究的傳統，倡導僧人進行佛學研究，以闡釋佛教博大精深的教理。他還提出改革僧伽制度、改進佛教教育、整頓寺院以及積極培養僧才的建議，認為只有這樣，佛教才能不被淘汰，才能適應時代需求。巨贊法師還曾設想具體方案並積極依之作行，但由於因緣不就，阻力重重，如同太虛法師的佛教改革方案一樣，巨贊的佛教改革之志亦未能得以實現。

巨贊法師《新佛教概論》一書雖然未能保存下來，但其基本思想觀點卻是前後一致的。此後，巨贊法師一直致力於推動「新佛教運動」，寫出了《新佛教運動之史的研究》、《新佛教運動的中心思想》、《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新佛教運動與抗戰建國》等一系列以「新佛教」冠名的系列論著。巨贊法師的「新佛教」思想雖有前期和後期之分，前後有一些變化，但其「人間佛教」的基本精神和理念是一以貫之的，體現了其佛教革新的基本立場和觀點，是對太虛大師首倡的「人間佛教」思想的繼承和發展。⁹ 正因此，我們亦用「新佛教」一語來概括巨贊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

巨贊法師「新佛教」理論的基本內容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大乘佛教「菩薩行」：新佛教的基本精神

早在抗戰初期，針對佛教界的現狀，巨贊就提出：從事和完成新佛教的

9. 參見李華華：〈巨贊對太虛思想的繼承研究〉，載《宗教學研究》2011年第2期。

建設必須具備「兩種精神」，即「戰鬥的精神和創造的精神」。¹⁰巨贊法師認為，「要有戰鬥精神，一定先須具備創造的精神」，並說天下能夠有所成就的人都須具備這二種精神方能成功，佛教也不例外。如「釋迦佛出家以後，東參西學，幾乎當時所有的名師都被他訪過，但他並不以此為滿足，菩提樹下，自作活計，乃是他的創造精神的表現，結果因此成就了無上正等正覺」。¹¹

在巨贊法師看來，這「兩種精神」的實質即是大乘佛教的「菩薩行」。他後來曾說：「我們中國佛教，素來注重大乘菩薩行，菩薩行以利益眾生為基礎，離了眾生就不能成佛，所以處處回向眾生，完全在眾生中工作，利益眾生。」¹²而目前中國佛教的衰敗，也因為修行的人只羨佛的果德，而不學因地行為，「沒有很好的學因位菩薩，在眾生身上培養自己的福德，因此和眾生脫離了關係，受到一般社會的非難。」因此，他認為確立大乘佛教「菩薩行」就是孟子所說的「先立其大者」。¹³

大乘佛教的菩薩行，亦即濟世度眾的大乘精神。巨贊法師佛教改革思想並非就佛教而論佛教，他始終以世事民瘼作為佛教改革的價值取向。他在回顧與展望「新佛教運動」的歷史時指出：以楊仁山居士創辦的金陵刻經處為新佛教運動的發端，以太虛法師創辦的武昌佛學院（他稱之為「新僧的黃埔」）、歐陽竟無居士創辦的支那內學院為新佛教運動的進一步發展，而以巨贊本人組織的「南嶽佛道救難協會」和「佛教青年服務團」等為新佛教運

10.巨贊：〈兩種精神〉，《巨贊文集》，頁670。

11.同上註。

12.巨贊：〈從因緣說起〉，《巨贊文集》，頁777。

13.巨贊：〈先立乎其大者〉，《巨贊文集》，頁877。



動的「推波助瀾」，¹⁴從而把佛教改革與抗戰建國相所並論，並以歐洲近代史上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中的教訓為借鑑。巨贊法師的這種愛國主義思想一直貫徹在他所從事的佛教活動當中。新中國成立後，在1951年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中，巨贊法師寫了〈論佛教的愛國主義〉，專門論證佛教是如何主張愛國，佛教徒應當積極參加反抗侵略，保衛祖國的正文鬥爭。

縱觀巨贊法師的一生，就是實踐大乘佛教菩薩行的一生。他在致力於弘揚佛法、振興佛教的同時，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和國家社會建設，將出世法和入世法圓融為一體，實實在在地展現了不離世間覺的慈悲濟世的大乘精神。

（二）佛教革新的首要任務是教制改革

「佛教改革」或曰「佛教革命」作為近現代中國佛教界一個比較熱門話題，由此而有「新舊之爭」。實際上，現代中國佛教界所謂「新舊之爭」也從未中斷過。畢生致力於佛教改革的太虛法師就被視為革新派，另一些反對革新的佛教界人士則被歸為守舊派。巨贊法師倡導「新佛教」運動，作為佛教改革家，自然被歸為新派。但後來他對所謂佛教的「新舊之爭」卻有著另有一番解釋。在解放初期全國政協宗教事務組召開的一次座談會上，喜饒嘉措大師曾這樣說道：「改革二字，對於佛教未可輕用……（佛教）教理與修養，即所謂佛教，絕不容有所變更。」對這一「改革」說法，巨贊也表示贊同，¹⁵他還說過：「佛理本無新舊，互古今而常新」，¹⁶佛理（法）作為佛所發現的「真理」，其基本精神沒有也不能有任何改變。因此，巨贊所謂的佛教革新或革命，首先是指教制革命、教產革命，也就是佛教如何與時代社會

14. 巨贊：〈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巨贊文集》，頁644。

15. 巨贊：〈一年來工作的自白〉，《巨贊文集》，頁716。

16. 巨贊：〈佛教界如何方能聯合〉，《巨贊文集》，頁824。

現狀相適應的問題。

巨贊法師還從佛教的「因緣」說來分析當前佛教所面臨的社會問題：「人依外緣才能生存，離不開社會關係，因此也就不能不受社會的影響，發生許多問題。」並認為佛教在印度的衰敗，「就是受了外緣的影響，本身變了質的關係。」¹⁷巨贊法師「從小就愛好佛學，改革全國佛教教務是我的素願」，¹⁸而佛教界存在的弊病「歪風」主要可歸結於佛教制度，「尤其是寺院制度的不良」，因此應當「先把佛教現行的制度改革好，然後再整理思想」。¹⁹巨贊法師的「新佛教運動」主要包括「整理僧制」與「整理教理」二大行動綱領，並進一步具體落實到「生產化」與「學術化」這二個方面。這無疑是對太虛大師當年倡導的教制、教理、教產「三大革命」說的繼承和發展。

（三）出家僧尼是新佛教運動的主體

「新佛教運動」的開展自然離不開佛教弘法主體的僧伽建設。依佛教傳統，出家僧尼為住持佛法，在家居士為護持佛法，故僧尼可為一寺之住持，而居士僅稱護法。在巨贊看來，佛教改革運動也應「自以僧尼所住之寺廟為主，而以居士次之」。²⁰同時他也認為，在將來的佛教中居士的責任也很重大，尤其是在整理思想方面，要擔當更多的責任。「為著續佛慧命，居士與僧徒應該真誠地合作起來，先把佛教的現行制度改革好，然後再整理思想。」²¹

17. 巨贊：〈從因緣說起〉，《巨贊文集》，頁776。

18. 巨贊：〈一年來工作的自白〉，《巨贊文集》，頁706。

19. 巨贊：〈人民政協對於佛教界進行革新的啟導作用〉，《巨贊文集》，頁682。

20. 同註18，頁710。

21. 巨贊：〈人民政協對於佛教界進行革新的啟導作用〉，《巨贊文集》，頁682。



然而，作為佛教改革的主體，目前中國佛教僧尼的現狀卻不如人意。「近數十年僧尼中固不乏高明之人，而一般素質，每況愈下，其信仰學識頗有遠在居士之下者，惟其主持佛法之身份，則始終不渝」。²²實際上，「佛教之所以衰落由於沒有人，要整理佛教當然還是人；人的培植在於教育，過去的僧教育，真要嚴格說起來足夠不上稱為教育的。招幾個略識之無的人互相咀嚼一下，詩云子曰，如是我聞，三年一畢業，就算學業圓滿，法海無邊，實際上則是盲盲相引，連天高地厚也不曉得，出路問題，更談不到。」²³因此，巨贊的新佛教運動非常重視佛教教育暨僧伽人才的培養，以提高出家眾的基本素質。

那麼，什麼樣的素質才是合格、優秀的僧伽的品格呢？巨贊強調榜樣的力量，要向佛教界的時賢、先進學習：「佛教教務的改革是必然的，但必須吸收佛教界優秀的素質，作為基本精神。像印光老人的『真誠』，弘一大師的『清逸』，虛雲和尚、寂雲和尚的『刻苦』，太虛法師的『念念不忘佛教』，以及歐陽竟無居士的『赤膽熱烈，願力莊嚴』，都是值得取法，並加以發揚的」。²⁴

（四）學術化、生產化：「新佛教」建設的三大主張

巨贊的新佛教思想，內容豐富，體系完整。若具體的行動主張或綱領來說，可歸結為他早年《新佛教概論》中就提出、此後一直堅持的「學術化」、「生產化」這三大基本主張。較之太虛大師的佛教改革思想，這三大主張可謂巨贊法師新佛教思想的「創新」之處。

22.同上註。

23.巨贊：〈所期望於佛教整理委員會者〉，《巨贊文集》，頁665。

24.同註20，頁706。

所謂「學術化」，也就是要重視佛教教理的整理和研究，以恢復佛教教義的本來面目。印度原始的僧伽制度重視學術，如玄奘在印度學法的那爛陀寺，就是印度古代的學術中心；重視學術同時也是中國佛教文化的優良傳統之一。巨贊法師認為學佛、佛學不可分，「注重行持之學佛者，必須以注重知識之佛學為基礎。」²⁵即知行不可分割。因此，通過「學術化則恢復原始僧伽制度，使每一個寺廟都造成學術團體，而每一個和尚都是文化人。」²⁶

另一方面，在學術研究方法上，巨贊還特別重視佛學研究中科學方法的運用，用科學方法處理佛教問題，運用科學的觀點和方法撰寫「佛教通史」。²⁷因此，巨贊的學術化主張也是近代以來對「科學」方法的自覺借鑑。

所謂「生產化」，是指僧徒通過直接參加生產勞動的形式，實現生活自給自足。巨贊法師主張「生產化」，強調充分利用資源，組織僧尼開展生產勞動，實現自養；同時還可開辦佛教工廠、醫院、養老院等佛教事業，以便更好地服務社會。中國佛教自古就有「農禪」的傳統，早在唐代百丈懷海禪師倡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家風，對中國佛教影響深遠。巨贊法師之所以提出中國佛教「生產化」的主張，顯然是對中國佛教這一優良傳統的繼承。同時，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倡導佛教的「生產化」，還有現實因素的考量：一是回應自民初以來此起彼伏的「廟產興學」思潮，即如何來合理處置寺產問題。巨贊法師認為，這是教制改革的一個關鍵「樞紐」所在。²⁸另一方面，則是針對佛教界存在的弊端的批評：過去中國佛教界的一個通病——

25. 巨贊：〈佛教界如何方能聯合〉，《巨贊文集》，頁826。

26. 巨贊：〈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巨贊文集》，頁650。

27. 巨贊：〈愛科學〉，《巨贊文集》，頁1118-1120。

28. 巨贊：〈怎樣處置廟產〉，《巨贊文集》，頁659。



以「清閒」為貴，「有輕視勞動的現象」²⁹這是中國佛教一個不好的傳統，也是導致後來佛教之衰敗之一個重要原因。

「學術化、生產化」二大主張，是巨贊法師借鑑太虛法師佛教革新的經驗與教訓基礎上而提出的具體而明確的行動綱領，是「人間佛教」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雖然其中還帶有一定的理想成份，但對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改革思潮還是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四、巨贊法師「新佛教」理論在1949年以後中國的實踐

巨贊法師早年追隨太虛法師，積極投身於佛教革新運動，並在1949年建國後成為中國大陸佛教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繼續推進其佛教改革的主張。他所提倡的生產化、學術化兩大改革要求，也成為社會主義中國「新佛教」建設的重要內容。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終於使得二十世紀的中國擺脫內亂外患的動盪局面，走上了和平統一的現代化建設之路，這也為中國大陸佛教改革由理論走向實踐提供了可能。面對這一新的情勢，巨贊感到他多年盼望的佛教革新的機遇終於來到了，於是為佛教的事業積極奔走，在佛教革新暨中國佛教現代化的道路上做出了一系列的嘗試和努力。

在此社會文化嬗變之際，巨贊法師聯合佛教界領袖和有識之士上書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對新中國佛教革新提出若干建設性意見，再次提出以「生產化」和「學術化」主張，又提出「新叢林」之詳細規劃及設想，革除佛教中的糟粕成分，以適應新中國的社會環境。³⁰從實踐層面來看，一方

29. 巨贊：〈愛勞動〉，《巨贊文集》，頁1106。

30. 巨贊：〈一年來工作的自白〉，《巨贊文集》，頁705-708。

面，巨贊法師因時適變，會同周叔迦居士等創辦大雄麻袋廠、籌備大雄印刷廠，組織僧尼參加勞動生產，以踐行其「生產化」的改革主張；另一方面，巨贊法師還創辦並主編《現代佛學》雜誌，與趙樸初等發起成立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中國佛學院等等。應當說，這些舉措對聯合佛教團體、維護佛教的整體利益、促進佛教教育和學術研究以及穩定當時的佛教界人士的情緒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文革」之前的中國佛教改革和建設事業中，作為出家人的巨贊法師所發揮的作用和做出的貢獻最為突出。誠如會覺法師在給巨贊法師來信中所說：「你近來代替了太虛大師的領導崗位，這也許你並不這樣想，事實確是如此的。你的工作條件較之他好多了，『三反』、『五反』是打下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基礎！此時談統一組織是應該的，佛教必須通過這個工作始能生存發展。」³¹在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新佛教建設過程中，除巨贊法師之外，圓瑛法師、趙樸初居士、周叔迦居士等高僧大德都發揮過重要作用，特別是趙樸初居士，作為新成立的中國佛教協會的副會長兼秘書長，與巨贊法師一起是當時大陸佛教界的實際領導人。就新時期中國佛教的理論指導和建設而言，巨贊法師及其「新佛教」理論所發揮的作用也最為顯著，「代替了太虛大師的領導崗位」。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因素，一個時期以來海內外學術界比較忽略對巨贊法師及其新佛教理論及其影響的研究，並且關於如何認識和評價這一時期巨贊的佛學思想及其對中國佛教的貢獻，意見評價也很不一致。近些年來，國內學者逐漸重視巨贊法師的佛學思想及其對於新中國初期佛教建設的努力和貢獻，相關論文也有不少發表。³²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認為巨贊的佛教改革思想是對

31. 會覺：〈會覺致巨贊書〉，《巨贊文集》，頁1209。

32. 王永會：〈人間佛教在當代的倡導與實踐〉，《佛學研究》，2000年刊；陳衛



太虛法師「人間佛教」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但如何進一步認識和評價巨贊在新中國佛教建設中的貢獻及歷史影響，還有待深入。

不過，鑑於巨贊法師在其「新佛教」建設的努力和實踐中，特別是在現代中國佛教與社會轉型期這一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比較注重宗教與政治（政府）的合作，主張佛教徒應「結合政治」、「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愛國主義」等，因而有學者認為其新佛教理論在「人間化」的命題之下，呈現出「政治化」的形態。³³對此，本文認為還是可以作進一步的探討或辯證分析的。

據《巨贊文集》中「問題商討」一文記載：解放初期，在全國政協宗教事務組曾於1950年5月5日舉行的第二次座談會和6月10日舉行的第四次座談會上，當時出席會議的內務部副部長陳其瑗傳達了周恩來總理對於宗教問題的指示，大意为：「政府與宗教的合作，在於政治上一致，而不求思想的一致。各宗教應在教言教。」³⁴將「政治上一致」與「思想上一致」相區分，也就是說，對於宗教徒來說，只要求他們在政治立場上與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同時並不主張改變其原有的宗教信仰。無疑，這一說法充分反映了周恩來總理及當時的中央政府在處理新中國宗教問題上的智慧。在新中國佛教改革的實踐上，巨贊法師也正是充分地貫徹了周總理這一指導方針。

華、鄧子美：〈人間佛教的理念與實踐〉，《宗教學研究》，2009年第4期；〈巨贊對建國初期佛教建設的歷史貢獻〉，《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0年12期；李華華：〈人間佛教視閥中的生產化與學術化〉，《安徽大學學報》，2009年7月；李華華：〈巨贊對太虛思想的實踐研究〉，《宗教學研究》，2011年第2期。尚有若干篇碩博士論文，而2008年11月在廣西召開的「西山論壇·佛教文化暨巨贊大師誕辰百年學術研討會」則彙集了更多的類似論著。

33. 李向平：〈「生產化」與「學術化」——巨贊法師的現代新佛學思想及其實踐〉，載《巨贊大師誕辰百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8年11月。

34. 〈問題商討〉，《巨贊文集》，頁713。

巨贊法師曾說：「出家人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甲、能夠結合政治，為人民服務。乙、通達教理，嚴淨毗尼。丙、能夠滿足人們的宗教要求。」³⁵所謂「能夠結合政治」，主要表現為他曾號召佛教徒學習馬列主義，在政治立場上與政府保持一致。巨贊法師強調：「佛教與其他宗教本質上不甚相同，故理論上與馬列主義頗有相通之處。」³⁶但他又說：「我們佛教徒固然應該學習馬列主義以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但是不必牽強附會，甚或曲解、錯解以比附馬列主義。否則雜拌兒加鹽加醬，既失宗教信仰自由之意，同時也不足以登學術的大雅之堂，對於佛教界的進步，可能是有妨礙的。」³⁷

可見，巨贊所說的「結合政治」、「學習馬列主義」、「學習愛國主義」實是指佛教徒的政治立場，是佛教僧人要不要愛國的問題，而不是宗教信仰的問題。巨贊法師清醒地認識到政治與宗教、學術之間的界限和不同，並且旗幟鮮明地主張：只有政治立場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方能更好地做好宗教的本職工作。

在建國初期巨贊法師從香港回到北京，在政府和佛教界之間積極奔走，他首先是為中國佛教的整體利益考量，處處維護的是佛教的整體利益，正如他自述：「為佛教在新社會中，爭取一個合理的立場與正當的工作崗位而到北京」。³⁸巨贊相信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恢復佛教本來面目，實踐大乘菩薩行的因緣時節已經成熟，希望大家在大時代中爭取做個標準的佛教徒，為祖國、為人民、為佛法重光，而貢獻自己的一切力量。」³⁹

35.巨贊：〈略談佛教的前途〉，《巨贊文集》，頁761。

36.巨贊：〈問題商討〉，《巨贊文集》，頁787。

37.巨贊：〈對於佛教界內一些不妥當的言論的商榷〉，《巨贊文集》，頁902。

38.巨贊：〈一年來工作的自白〉，《巨贊文集》，頁711。

39.巨贊：〈從因緣說起〉，《巨贊文集》，頁778。



巨贊法師還以圓瑛法師的態度轉變為例，說明解放初期新中國的佛教建設的積極意義和成效。「圓瑛老法師今年已經75歲了，在佛教界內一向屬於保守的一面。解放之初，他不明白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究竟要怎樣搞法，他也不明白佛教在中國究竟有無前途，所以有一個時期曾經閉門謝客，不問時事，態度是相當消極的。可是後來新中國的每一件事實都證明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堅強的站立起來了，佛教也得到了充分的信仰自由，所以他仍舊在上海講經，辦法會，而盛況不減當年，此次又不辭辛苦出席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⁴⁰這表明：建國初期巨贊等人所領導和推進的佛教改革的一些舉措和政策，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也得到了像圓瑛法師這樣的高僧大德的認可和支持。

然而，受極左思潮的影響，特別是「文革」的爆發，使得中國大陸的佛教革新運動乃至正常的佛教活動遭遇挫折，乃至完全中止。巨贊法師的新佛教建設的實踐亦隨之停止了。直到「文革」結束，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逐漸得到落實和恢復。1983年12月，趙樸初會長在代表中國佛教協會在第四屆中佛協理事會第二次會議上所作的《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的報告，突出強調了將「人間佛教」思想的提倡作為中國佛教發展的長期指導思想，並與之配套提出發揚中國佛教「農禪並重、注重學術研究和進行國際友好交流」的三個優良傳統。「人間佛教」的思想和理念得到重新恢復，而趙樸初居士所總結的中國佛教三大優良傳統，無疑是對巨贊法師新佛教理論「學術化、生產化」二大主張的豐富和完善。

隨著「人間佛教」思想在中國大陸的普及以及宗教政策的落實，二十世

40. 〈佛教在新中國〉，原載1953年1月1日香港《大公報》，朱哲編：《巨贊法師全集》（八卷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頁975。

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宗教文化呈現出復興之勢。伴隨著這一過程，我國主流的宗教學理論關於「宗教」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由「宗教是迷信」、「宗教是一種文化」到「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樣一種理論模式的轉變。

二十世紀90年代，中國宗教學領域一個最顯著的理論突破，就是明確提出了「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一命題，並成為我國宗教工作的指導方針。⁴¹可以說，當代包括佛教在內的宗教文化的繁榮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這一指導方針是分不開的。通過前文分析，我們認為，巨贊法師佛教改革思想在新中國的實踐充分表明：其實質就是探索佛教如何才能與社會及時代相適應（即「契機」），如何與馬列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相調和。巨贊法師等改革的先驅者以極其敏銳的洞察力和深刻的見解，提出了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即「佛教如何與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問題。換言之，「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努力和嘗試，早在50年代就已經開始了。這一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五、結論

在中國近現代的佛教革新運動暨「新佛教運動」發展史上，楊文會、太虛法師、巨贊法師三人是清末以來領導中國佛教革新運動的三位領袖人物，其中楊文會、太虛的歷史地位和影響，已經為佛教的學界和教界所公認。然而，巨贊法師及其「新佛教」理論對新中國佛教革新和建設的重要貢獻還有

41. 江澤民：〈高度重視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綜合研究組、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政策法規司編：《新時期宗教工作文獻選編》，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頁253。



待人們繼續深入探索、研究。這其中有不少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值得認真總結和反思。

參考書目

- 1.《巨贊大師誕辰百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西桂平，2008年11月。
- 2.《巨贊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版。
- 3.《趙樸初文集》（上、下卷），華文出版社，2007年。
- 4.于凌波：《中國近代佛門人物志》（第四集）台北慧炬出版社，1998年初版。
- 5.朱哲編：《巨贊法師全集》（八卷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月。
- 6.何建明：《佛法觀念的近代調適》，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
- 7.李明友：《太虛法師及其人間佛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
- 8.郭朋、廖自力、張新鷹：《中國近現代佛學思想史稿》，巴蜀書社，1989年10月。
- 9.陳兵、鄧子美：《二十世紀中國佛教》，現代禪出版社，2003年。
- 10.黃夏年主編：《近現代著名學者佛學文集》之《楊仁山集》《太虛集》、《巨贊集》、《歐陽竟無集》、《印順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12月。
- 11.鄧子美、毛勤勇著：《星雲八十》，太平慈光寺，2007年出版。
- 12.鄧子美等著：《當代人間佛教思潮》，甘肅人民出版社。
- 13.學愚著：《人間佛教：星雲大師如是說、如是行》，香港中華書局。